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奚仲文化与社会发展

邓兴珍 沙雪斌 陈炜晗 著



奚仲文化与社会发展

邓兴珍 沙雪斌 陈炜晗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奚仲文化与社会发展/邓兴珍, 沙雪斌, 陈炜晗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607-4298-4

I. ①奚…

II. ①邓… ②沙… ③陈…

III. ①文化史—研究—枣庄市

IV. ①K29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954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237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薛国是位于鲁南地区较为著名的古国之一。它从夏代到秦统一六国止,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年之久,后经数千年的变迁沿革,成为今天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薛城(今属山东枣庄)。

古薛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当我们披阅古薛历史时,不难发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人文佳话。其中,四千年前,杰出的科学家、薛人先贤——奚仲,因发明了中华大地上的第一辆马车,被称为“造车鼻祖”,名垂青史。

据史料记载,奚仲生活于禹夏时期,是治水英雄大禹的重臣。因有功于夏而封于薛,为夏车正(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专门负责夏王朝的车服之制。奚仲任车正职务期间,上继其父番禺,下偕其子吉光,指挥着庞大的造车队伍,在封地奚邑之奚公山、奚邑城(均在今薛城区陶庄镇境内),“斫木为轮,构架为体”,在薛地创制了领先世界水平的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管子》一书对奚仲所造车辆称赞说:“奚仲之为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

车的发明,是中国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其影响甚至不亚于现今人们常说的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发明对人类的贡献。车的出现使“引重致远”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远程交通条件,它不但解决了落后的交通问题,而且还促进了道路建设,乃至整个交通事业、社会事业的极大发展,加速了地域之间的商贸融通、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加快了人们征服自然的步伐,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奚仲造车事迹在国外亦有深远影响,德国奔驰集团视奚仲为世界车文化的始祖加以崇拜,

并在其汽车展览馆里设立了奚仲塑像。

奚仲造车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它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奚仲造车是中国古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典范,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

奚仲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值得大力提倡,永久发扬。因此,把奚仲文化研究好、传播好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为全面推介奚仲文化,“奚仲文化与社会发展”课题组的成员将其研究的成果编撰成了《奚仲文化与社会发展》一书。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产生都要依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发展基础,古薛国所处的区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发展基础为奚仲造车和奚仲文化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本书首先梳理了古薛国的自然人文环境;其次,在梳理古薛国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基础上,从历史传说和文献学等方面对奚仲人物、奚仲造车、薛国的建立和变迁以及任、奚、薛及其分支姓氏一一做了较为翔实的考察和研究;最后,揭示奚仲文化的内涵与实质,阐释弘扬奚仲文化在促进人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编著者站在弘扬奚仲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以时代的视角,把翔实的材料与科学的考证融为一体,切实而又生动。该书内容翔实,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是一本传播奚仲文化的生动教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历史记忆,是一个地方的灵魂,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并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相信:阅读本书,对于宣传、推广奚仲文化,丰富古薛文化内涵,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人的创新精神,激励我们努力建设创新型社会,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应编著者的盛情邀请,我有幸先读到此书,感触颇多,故写了上面一些体会。是为序。

曹胜强
2010年夏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缘起	(1)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视角和方法	(2)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框架	(3)
四、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5)
五、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5)
第一章 奚仲文化产生的自然人文环境	(7)
一、自然地理生态环境	(7)
二、东夷族早期的社会生产活动	(9)
三、北辛文化：东夷文化的典型代表	(23)
第二章 奚仲造车的历史考察及价值追问	(34)
一、传说中的奚仲形象	(34)
二、奚仲及奚仲造车的文献学观察	(53)
三、奚仲造车的考古学研究	(59)
四、关于奚仲造车的理解	(67)
五、奚仲造车的价值和意义	(78)
六、车的演变与车文化研究	(85)

第三章 任、奚、薛姓氏溯源及其分支姓氏考证	(90)
一、姓氏的起源及发展衍变	(90)
二、任姓溯源与迁徙	(104)
三、奚姓溯源与迁徙	(150)
四、薛氏溯源与迁徙	(171)
五、分支姓氏考	(192)
六、任、薛后裔名人辑录	(202)
第四章 薛国的建立与变迁	(205)
一、任姓薛国的建立	(205)
二、薛的含义	(211)
三、奚氏与薛国	(212)
四、任姓薛国的历史变迁	(220)
五、薛国国君世系及国都迁徙	(234)
第五章 弘扬奚仲文化 促进社会发展	(238)
一、奚仲文化的内涵、渊源及核心	(239)
二、奚仲文化与人的发展	(255)
三、奚仲文化与社会发展	(273)
结 语 中国传统文化和奚仲文化的断裂	(289)
主要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295)

绪 论

一、问题的缘起

奚仲，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科学）家，是奚姓、任姓、薛姓的祖先，也是薛国的始祖。奚仲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集当时造车技术于一体，发明制造了中华大地上科技含量高的以木结构为主的马拉的车，因而被世人称为“车鼻祖”、“车圣”、“车神”。诸多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不约而同地记载我国最早的造车者为奚仲，可见，夏代“居于薛”的奚仲发明了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车的发明和完善未必是奚仲一人所能为，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尊奚仲为“造车鼻祖”。因此，奚仲是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的历史人物，奚仲文化作为华夏文化中极具魅力的重要文化元素，以其特有的科技创新的文化特质，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奚仲造车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

奚仲造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奚仲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值得挖掘、研究和发扬。然而，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国外学界

尚无人研究奚仲与奚仲文化，国内学界也仅有少数专家、学者，包括奚仲故里的地方学者对奚仲文化进行初始研究。他们对奚仲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关于奚仲的历史文化遗迹、遗址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挖掘和整理，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都刚刚起步，研究的系统性不强，理论的深度也有待提高。因此，奚仲文化仍是中华历史文化研究中有待发掘的珍宝。

文化是人在改造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活动中所展示的、体现人的本质和力量的方面及其成果，其内涵既应体现在活动方式和成果中，也应体现在人的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中。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反过来又塑造着人类自身，成为人与社会的具体存在方式。

当今世界，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高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文化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创新能力的竞争。可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全方位挖掘奚仲文化，打造和宣传奚仲文化，弘扬奚仲造车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培养公民的创新意识，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以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都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视角和方法

本书拟从奚仲造车所彰显的创新精神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这一理论视角，突破只对奚仲进行“史”的研究而与现实相脱离的倾向，重点研究奚仲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在齐鲁文化中的地位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形成的深刻影响，并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阐释研究奚仲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本书的研究在揭示奚仲文化的内容及实质的基础上，着重从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的方法以及调查研究的有关理论，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讨论奚仲文化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

1. 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是一种以间接的形式获取资料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超越时空条件的限制，从古今中外极其广泛的文献中收集和研究与课题有关的资料。

2. 调查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以直接的方式获取资料的方法。我们通过调查走访，获取民间大量的关于奚仲的传说等经验事实材料。

3.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在获取大量事实材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从而揭示奚仲文化的内容和实质，阐释奚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框架

本书将在大量占有史料、考古资料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阐释奚仲文化的实质以及奚仲精神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体说，本书计划分为五个部分：

一是奚仲文化产生的自然人文环境。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古薛国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和东夷部落早期的社会生产活动，说明北辛文化是东夷文化的典型代表，奚仲文化产生与发展应源于北辛文化。

二是奚仲造车的历史考察及价值追问。通过对奚仲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的整理和对关于奚仲的历史遗迹、遗址挖掘材料的分析，展现上古时代一个心忧天下、造福人民的人物形象。同时通过对奚仲造车的考证，考察奚仲造车的历史背景、过程和马车

的结构、功能等，说明奚仲发明的车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伟大创举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论证奚仲在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阐释奚仲造车的文化意义。

三是任、奚、薛姓溯源及分支姓氏的考察研究。通过对中国姓氏的起源，对任、奚、薛姓溯源、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证实奚仲氏族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勇于创新的典范，反映出任、奚、薛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经历怎样的繁衍变迁，出现过多少名人贤士，有哪些优秀文化需要我们传承。

四是薛国建立与变迁的考证。通过对任姓薛国的建立、薛的含义、奚氏与薛国、薛国的历史变迁以及薛国国君世系和国都迁徙的考证，展现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演变、文明起源、民族融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与习俗的发展与变革。

五是弘扬奚仲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社会的每次转型、人的每次提升都与科技的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创新通过对生产力的影响而变革着生产关系，进而作用于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同时，社会需要又是创新的外部动因，它与创新畅通了渠道，创造了条件。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本部分在揭示奚仲文化的内涵、指明奚仲文化的实质的基础上，阐释奚仲文华是一种创新的文化，弘扬奚仲文化在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说明弘扬奚仲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总之，今天我们研究奚仲文化，弘扬奚仲精神，就是要以“奚仲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为切入点，充分彰显“奚仲故里”的文化底蕴，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1. 奚仲文化是一种创新的文化。通过对有关奚仲材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系统阐释奚仲文化的内容和实质,提出并论证奚仲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的观点。

2. 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奚仲精神。人与社会是关系性的存在,二者相互依存,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形塑。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弘扬作为科技创新的奚仲文化,在唤醒和培育人的主体性过程中必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和主要推动力,历次重大科技创新,都引发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我们弘扬奚仲文化,提倡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的奚仲精神,必将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建设创新型社会,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历史文献对奚仲和其造车事迹的记载比较零星和分散,而且奚仲是出自黄帝世袭还是东夷部落的后裔,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奚仲是薛国始祖,被称为“造车鼻祖”,奚仲死后葬于奚公山(今属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境内),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奚仲造的是什么车?什么模样?还不是很清楚。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奚仲造的是马车,这种定位也不是太准确。神话传说中的奚仲更是神奇多彩。种种疑虑都需要专家、学者通过不懈的努力、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答案。

目前关于奚仲及奚仲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是一个有待作细致研究的领域。2008年4月25日,枣庄市薛城区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办了首届中国奚仲文化研讨会，邀请了清华大学、中国先秦史学会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对奚仲文化进行研讨、论证。“奚仲故里在薛城”得到权威专家的一致认定。2009年11月9日，在薛城驻地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奚仲文化研讨会，全国史学界、考古界、企业界、新闻界、奚仲后裔代表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围绕“奚仲与现代科技”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论述。

围绕这一课题，笔者对有关奚仲的历史文献和奚仲文化研讨会上专家的讲稿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又与薛城区委宣传部合作，在奚仲故里作过一系列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分工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一章 奚仲文化产生的自然人文环境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产生都要依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发展基础，古薛国所处的优越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发展基础为奚仲造车和奚仲文化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各种文献记载可知，奚仲生活于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初期。早在距今约 1 万年 ~ 15000 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古薛国一带活动；在距今约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此定居并从事农业耕耘了。从文化内涵分析，自距今约 6000 ~ 4500 年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距今 4500 年前的山东龙山文化，古薛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较发达。进入夏朝，无疑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夏朝社会的进步与经济实力的发展，使奚仲造车成为一种必然的产物。

一、自然地理生态环境

地理环境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薛国故地，在今天的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官桥、张汪和薛城区境内。对于薛国的地理环境，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中有一段记载：

“海岱及淮惟徐州（《禹贡》里的徐州指的是薛，《后汉书·地理志·郡国二》说：“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①，淮沂其珇。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土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峤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珇珠暨鱼。厥篚玄纁缟。浮于淮泗，达于河。”从这则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薛地确是一个有山、有水、有丘陵和平原，而且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的地方。在薛的东面，有绵亘不断的群山，林牧业十分发达；西面有滔滔不绝的泗水，贯穿四个湖而南达江淮，北连济漯和黄河，舟楫交通十分方便；中部一片平原，有方圆百里的沃野，薛河横卧境内，自东向西流入微山湖，不仅便于灌溉，而且利于防洪排涝，很适合农业发展。薛这个地方的原始居民，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里，其发展速度确比周围其他地区要快。约在夏代，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薛国。据文献记载，夏朝王畿内外分布着许多封国，当时在今山东省境内的邦国主要有：少昊之墟（曲阜）、薛、缙、有莘氏、有虞氏、有缙氏、顾等。这里有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的“万国林立”的城邦时期。1993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对薛国故城的复探和试掘中，在薛国故城内尤楼城东南部钻探出数百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又在滕州市境内考古发掘出100多处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址，分布在薛国故城上游及周边地区的就有60多处。可以说，薛地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这个时期的城址与薛地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薛国在我国万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除了薛国先民辛勤经营外，与其占有的区域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古代先民为了生存与发展，往往选择有山、川、湿地、平原等的地理环境区

^① 撰者注。全书下同，不再一一注明。

域，以利于生息繁衍。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古代，平原可以进行原始农业运作，但仍需依靠山林的采集、狩猎。先民选择的生存环境是关系着他们当代与未来延续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薛国先民也不例外，他们选择了薛河流域。这一区域，恰好有山、川、湿地、平原等条件。薛河古称“薛水”，是一条常年径流的河流，其源头位于枣庄市山亭区，为东江、西江两支。西江源于水泉乡柴山前；东江源于徐庄乡米山顶。源地地带属低山地貌，山的高度一般在100~300米，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东江、西江均流向西南，至海子村东南汇合为薛河，由此径向西南，流经山亭、西集、羊庄、官桥、柴胡店、张汪等乡镇，到圈里村入微山县注入微山湖（原为泗水）。薛河流至羊庄段海拔降至70米左右，至官桥镇海拔则为50米左右，至微山县境内海拔降至30米左右。羊庄以上为低山丘陵地带，其下逐渐形成河谷地带，官桥镇以下基本为平原，濒湖地带原应为湿地。在此要解释一下，微山湖形成大致在金代以后，在此以前为泗水由此向南流经之地，地势较低，周边多为湿地，因此推测，在古薛国时期，现濒湖地区应为湿地。薛河全长81公里，流域面积为960平方公里，流经区域有低山丘陵、河谷地带、山麓前沿平原、湿地等多样性地理环境，为先民提供了可耕、可捕、可狩和可采的生活条件。

我们称上述环境优越，是依据北辛、前掌大等遗址出土资料加以分析的。北辛遗址测定年代距今约7300年，孢粉检测含有海金沙、蕨类等，这些都属于亚热带遗存。这表明北辛文化阶段，薛河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比现今高出 2°C ~ 3°C ，这种气候为原始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东夷族早期的社会生产活动

东夷是华夏人对东方民族的泛称。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

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等地还留存着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

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这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用不同的地理方位对东方劲敌进行概括罢了。山东境内是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期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东夷文化是华夏东部族群文化。《尚书》有“蛮夷华夏”，夷为独列族群。《后汉书》有“东夷列传”，指明东夷是东方相对独成风格的族群。李白凤先生在《东夷杂考》中认为，东夷族生活的地域在今天的山东、苏北和河南东部等地。华夏文化是由东西部地域邦族融会而成的，东夷是华夏文化的东部源地。

（一）东夷经济概况

1. 农业

农业的发明使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从而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辉煌灿烂的文化。

北辛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比较粗糙，多为打制、琢制和打磨兼施，磨制极少。以滕县北辛遗址^①为例：农业生产工具中，打制石斧106件、石刀7件；磨制石铲15件、石刀14件、石镰6件、磨盘8件、磨棒7件、斧1件、杵7件。除了石制生产工具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